

第一章 总 论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贵州省“山川秀丽，气候宜人，资源丰富，人民勤劳”是一个潜力较大的近海内陆省，理应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较大的成绩和积极的贡献。然而，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目前贵州省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仍处于落后的地位。因此，如何加快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振兴贵州，实现兴黔富民的伟大目标，乃是贵州全省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第一节 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考察

当今的贵州，是历史的贵州的延续和发展。探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不能不对它的历史作一番考察。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第 603 页）考察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史，对于弄清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创造当代贵州的历史，对于研究和推动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古代建制沿革来看，贵州是我国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各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在这块土地上，为开发祖国的西南，繁荣祖国的经济和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春秋战国以前，现今贵州一带地方属于“荆楚”或“南蛮”的一部，为荆州的西南裔。春秋时代，贵州主要属于牂牁国；战国时代称为夜郎国。公

元 974 年(宋朝开宝 7 年)“ 贵州 ”这个名称 才见诸文献。公元 1382 年(明朝洪武 15 年)贵州才开始设立指挥使司 即在贵州历史上首次建立了省一级的军事机构。公元 1413 年(明朝永乐 11 年)建立贵州布政使司(即省政府)从此 贵州才正式成为一个行省。公元 1416 年(明朝永乐 14 年)又建立贵州按察司 主管刑法。至此 贵州三司俱全 方与各行省相同。清代 朝廷对行政区域作了一些调整, 增划一些地方隶属贵州; 公元 1727 年(清代雍正 5 年)现今贵州的疆域才基本形成。所以 贵州建立行省 至今才 579 年 贵州现有疆域的形成 至今才 265 年。

从贵州经济社会和历史发展来看, 春秋时期, 在现今贵州的土地上, 部族林立, 其中的牂牁国最为强盛。战国初期, 牂牁国逐渐衰落, 夜郎国逐渐兴起。公元前 28 年至公元前 25 年(西汉成帝河平年间), 夜郎国灭亡, 封建的郡县制便在现今贵州的地域内确立。

但是, 在夜郎国灭亡之前, 贵州仍处于奴隶社会时期。然而, 这一时期的贵州经济, 已经进入了农耕阶段, 农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在黔西南自治州兴义市发掘的汉墓中, 曾出土了池塘田园模型, 内塑水田块块相联, 灌溉沟渠纵横交错, 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兴义汉墓中出土的文物还有铁斧、铁犁、铁锄、铁刀、铜器、兵器等等。这既反映了当时贵州与中原地区已经有着一定的经济联系, 也反映了当时贵州的农业和手工业已经具有一定的生产水平。

宋朝和元朝时期, 江西、湖南、四川等地的一些劳动人民不断迁入贵州, 他们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 促进了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贵州的大片土地得到了开垦, 不少地方开始出现了人口较为集中的农业区。明朝昭成祖 11 年(公元 1413 年)贵州行省的建立, 对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贵州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尽管当时的贵州已经建立了行省, 但大部分地区仍然推行元

朝实施的土司制度。然而，随着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土司制度的弊端和危害日益暴露出来。在土司统治的地方，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成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同时，土司头目还互相勾结，抗拒朝廷的变革。在这种情况下，清代统治者决定实行“改土归流”即废除土司制度，将土司的统治改变为流官的管理。从公元 1726 年起，用了 6 年的时间，在贵州进行了大规模的变革。把绝大部分土司统治的地区改为流官统治。这样，从土司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农民，积极开荒造田，努力发展生产，促进了贵州经济文化的发展。所以，清代前期，贵州的封建经济比前代有了较大的发展。

然而，鸦片战争以后，贵州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贵州的某些手工业行业曾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与当时国内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却晚了一二百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对贵州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十分猖獗。尽管如此，贵州的经济还是不断地向前发展。

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贵州涌现出一批官办的近代企业和手工业企业。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在贵州的矿冶业、印刷业、编织业、酿酒业等行业中，已有一批民族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出现；贵州的商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贵阳、安顺、遵义、铜仁、毕节、镇远、兴仁等地逐步发展成为一定规模的商业贸易中心。

公元 1911 年 10 月，辛亥革命爆发，沉重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势力。但不久，反动势力便向革命派反扑。贵州反动势力借用云南军阀唐继尧的力量来消灭贵州革命派，建立了一个由贵州反动势力与云南军阀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实行滇黔反动势力联合专政。从此，贵州进入了军阀统治时期。从 1912 年至 1935 年的 24 年中，贵州成了川滇黔各路军阀争夺之地。先后统治过贵州的军阀就有十多个。他们凭借武力和权力，大肆掠夺人民的财富，中饱自己的私囊。他们为了军事和政治的需要，先后兴办工厂、企

业，贵州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开始活跃起来，公路交通亦开始有所发展。但这时贵州的企业，处在军阀混战的冲击之中和帝国主义的重重压迫之下，步履艰难，发展缓慢。

1935 的初，当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贵州之际，蒋介石派国民党中央军尾随红军进入贵州，乘机解除了贵州军阀的军政大权。从此，贵州进入了由国民党政府直接统治的时期。

1937 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国东部沿海城市相继沦陷，一些工商企业被迫西迁。1938~1939 年，由外省迁入贵阳的厂商就有 101 家。社会上的资金也迅速投向工矿企业，从而使贵州的近代工矿企业逐步发展起来。1943 年，贵州的工厂数达到 154 家，资本总额达到 1.4 亿元。这是解放前贵州工矿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但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四大家族的垄断资本也乘机伸入贵州。四大家族的金融工商企业在贵州相继建立，使贵州官僚资本急剧膨胀。1943 年，官僚资本在贵州近代企业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为 66%，居于支配地位，垄断了贵州经济。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部分外省籍工厂纷纷迁回到原地。同时，由于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社会秩序混乱，货币贬值，苛捐杂税加重，人民生活困苦，商品市场缩小，工矿企业日趋衰落。1949 年，贵州的工厂数减少到 59 家。加之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的侵略和掠夺，贵州经济处于停滞状态。

然而，应该看到，民国时期贵州的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较显著的发展。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外省高校迁入贵州，对贵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从抗日战争以来，贵州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都有一定的发展。但整个经济命脉和文化教育事业均被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本所垄断，使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阻碍，1949 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只有 11.25 亿元，其中农业产值占 85.2%，全省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解放前夕，国民党溃败，官僚资产阶级又

大量携带资财外逃 使贵州很多工厂停工停产 不少民族工商企业纷纷倒闭 物资奇缺 通货膨胀 市场凋蔽 经济衰退 民不聊生。解放时，贵州经济社会呈一片衰落破败的景象。新中国的贵州省的经济社会发展 就是在这样一个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基础上艰难起步的。

第二节 解放后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成就

解放 40 年来，贵州省的历史，是贵州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是贵州经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40 年来，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40 年来，贵州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生产，顺利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各族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彻底翻身之后，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使贵州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0 年来，贵州省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主要成就是：

第一，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解放后，贵州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张旗鼓地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土地改革和对农业、手工业、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57 年，公有制经济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提高到 74.2% 公私合营经济提

高到 4.5% 私营经济下降为 21.3% 这就表明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全省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已经确立，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与此同时，我们通过实行计划经济制度，国民经济得到了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但是，1958 年以后 由于“左”的错误影响，不顾客观条件 盲目追求“一大二公”集体经济比重急剧下降 其他经济形式更趋萎缩。“文化大革命”期间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搞“穷过渡”因而公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形式近乎消失 经济生活陷入困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通过拨乱反正 调整、改革，一个适应贵州省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已经形成。1987 年 在工业总产值中 全民所有制经济占 84.4% 集体所有制经济占 13.3% 合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占 1.2% 其他经济形式占 1.1%。在农村集体经济中，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户达 510.4 万户，占全省农村总户数的 99.5%。商业和运输业，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个体经济比重也有所提高。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和在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为贵州省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促进了贵州省社会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1989 年 全省社会总产值达 408.18 亿元 比 1949 年增长 45.6 倍；工农业总产值达 335.14 亿元 比 1949 年增长 39.5 倍 国民收入 198.18 亿元 比 1949 年增长 33.5 倍 财政收入 32.14 亿元 比 1949 年增长 114.8 倍。

第二，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事业迅速发展。首先是在工业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解放前，贵州工业极其落后。解放后，经过 40 年的建设，已建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工业。1989 年 全省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有 2080 个 职工 68.84 万人。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达 167.77 亿元 相当于 1952 年全省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 839 倍。拥有包括大型机床、数控机床、高精度机床在内的各种金属切削机床和锻压设备 5 万多台。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电力、化肥、水泥、机械、航天、航空、电子、卷烟、丝织、造纸等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使贵州成为全国的重要能源基地、原材料工业基地和国防工业基地之一。经过 40 年的创业和发展，工业生产能力和工业产值有了较大的增长。1989 年，全省工业总产值达 201.45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 97 倍；主要工业品产量 1989 与 1949 相比，原煤增长 115 倍，达到 3496 万吨；发电量增长 1378 倍，达到 96.53 亿千瓦时；水泥增长 4220 倍，达到 295.51 万吨；酒增长 194 倍，达到 17.55 万吨；卷烟增长 39 倍，达到 205.05 万箱。

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生产水平显著提高。40 年来，全省共建蓄水工程 2.8 万多处，蓄水能力达 20 多亿立方米；1989 年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823.3 万亩，比 1949 年增长 1.3 倍。解放前，我省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省发电量的 61.8 倍。1989 年，全省拥有机械动力达 26.47 亿瓦，农用载重汽车 7191 辆，全年农村用电量达 4.8 亿千瓦时，化肥施用量（折纯）达 36 万吨，平均每亩施用化肥 13 公斤。随着全省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农业生产水平有了显著提高。1989 年，全省农业总产值达 133.69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 2.69 倍；粮食产量达到 708.25 万吨，比 1949 年增长 1.59 倍；油料产量达到 32.93 万吨，比 1949 年增长 13.80 倍；烤烟产量达到 31.58 万吨，比 1949 年增长 52 倍；茶叶产量达到 13649 吨，比 1949 年增长 9.3 倍；大牲畜年末存栏数达到 637 万头，比 1949 年增长 1.6 倍；生猪年末存栏数达到 13.5 万头，比 1949 年增长 3.56 倍。林业、副业、渔业也有较大发展。1989 年木材产量达 58.95 万立方米。全省农业生产结构已发生了变化，逐步由单一的粮食生产向多种经营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已有所发展，

农副产品商品率已有所提高。

交通运输能力和邮电通信能力已大大增强。解放前,贵州交通邮电事业落后。1949年,全省公路通车里程仅1950公里,邮路只有1.37万公里。解放后,先后建成了黔桂、川黔、贵昆、湘黔四条铁路干线和与之相连的开阳、湖林、水大、盘西四条铁路支线,省内铁路里程为1535公里。公路建设有了较大发展,1989年,全省公路通车里程为30716公里,90%的乡通了汽车,已拥有汽车85477辆,完成客运周转量126.53亿人公里,货物运输周转量223.46亿吨公里。内河航运里程达1800公里。民用航空已开通8条国内航线。现在,以贵阳为中心的交通运输网已经基本形成。邮电事业发展迅速,通讯能力不断扩大,全省邮电通信网络业已形成。全州市内电话用户达5.07万户,农村电话用户达1.59万户,邮路总长度达3.29万公里,邮电业务总量达7042万元,比1949年增长87.8倍。

第三,商业和对外经济贸易有了很大发展,城乡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较大改善。解放前,贵州商业较为落后,物资交流不畅,市场十分萧条。解放后40年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展开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全省城乡购买力不断增长,商业购销实绩逐年增加,对外经济贸易不断发展。1989年,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93.74亿元,比1949年增长49倍。1988年,社会商品纯购进总额为83.21亿元,比1950年增长360倍。1989年,我省已与5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对外经济贸易有了新的发展。1989年,全省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达1.58亿美元,比1957年增长74倍;其中出口总额达1.32亿美元,顺差1.32亿美元,外汇结存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也有了新的进展,中外合资经营项目和中外经济技术合作项目也有了较快的发展。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较

大的改善。解放前 贵州人民生活十分贫困。解放后 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善人民生活的措施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 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89 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 1777 元，比 1949 年增长 5.4 倍；农民人均纯收入 430.3 元，比 1949 年增长 7.9 倍，1989 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 44.54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 1.1 万倍。居民住房条件也有了较大改善 1989，城镇居民人均住房 10.43 平方米，农村农民人均住房 13.51 平方米。居民在吃、穿、用等方面 不仅数量增加 而且质量普遍有了提高。1989 年，全省城乡居民人均消费猪肉 19.19 公斤；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可用于生活费的货币收入为 1102.44 元。有些已经富裕起来的居民正在奔向小康生活。全省医疗和保健条件也比解放前有了较大的改善，加之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广泛开展，人民的体质已大大增强，平均寿命已大大延长。

第四 教科文卫体等事业蓬勃发展 精神文明建设得到了改善和加强。新中国成立后 我省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 积极发展了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1949~1989 年，全省高等院校由 3 所发展到 24 所 中等专业学校由 6 所发展到 112 所 普通中学由 74 所发展到 1578 所 小学由 741 所发展到 29385 所 各级各类全日制在校学生由 7.27 万人增加到 564.3 万人 增长 74 倍 适龄儿童入学率达 88.75%。

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省科学技术队伍不断壮大 科学技术水平迅速提高。1989 年，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自然科学技术人员达 20 万人 全省共取得科技成果 2000 多项，社会科学也取得较大的成就。

文化出版事业发展迅速。1989 年，全省有各类电影放映机构 3631 个 图书馆 84 个 广播电台 6 座 广播发射台和转播台 8 座，广播覆盖率达 52% 电视台 7 座 卫星地面站 688 个 电视差转台 793 个 电视人口覆盖率为 55.6%。1989 年，全省出版公开发行

的报纸 27 种 总印数 14477.39 万份，公开发行的期刊杂志 71 种，总印数 679.16 万册 各类图书 12339.4 万册。所有这些，都为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加强各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积极的作用。

卫生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1989 年 全省专业卫生技术人员 8.49 万人 比 1949 年增长 126.7 倍；年末各类医院病床达 5.74 万张 比 1949 年增长 58 倍；各种地方性传染病已经基本消灭或控制。

体育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航空模型、航海模型、射击等项目，曾在国际国内比赛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民族体育运动和群众体育运动的开展比较广泛，1989 年底，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人数为 273853 人 其中优秀级的近 3 万人，获国家级运动健将称号的 13 人。

精神文明建设得到了改善和加强。经过 40 年来的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 人们的精神面貌大大改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变革、勇于开拓、讲求实效、勤劳致富已成为时代的风尚。通过法制教育 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普遍得到增强，民主政治生活日益活跃起来，全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80 年代以来 全省城乡广泛开展了“文明村寨”、“文明单位”、“文明城镇”、“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等活动。一种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正在逐步形成，一批精明能干的企业家和农村勤劳致富的能手及各种人才不断脱颖而出，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正在茁壮成长。

解放后 40 多年来，贵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全省各族人民团结一致 艰苦奋斗的结果 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

第三节 贵州四十年来 变革农村生产关系的经验教训

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回顾我们贵州省 40 年来变革农村生产关系的实践，总结经验教训，是一件很有意义而又极为有益的事情。

（一）前 30 年贵州农村生产关系变革的历程

解放后从 1950 年到 1957 年，我省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比较快，全省粮食产量年均增长 10%。那几年林茂粮丰，五业兴旺，粮食自给有余，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民生活显著改善，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从 1958 年以后，我省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就缓慢了。从 1958 年到 1979 年的 22 年中，我省农业人口平均每年增长 2.23%，而粮食产量年均仅增长 0.7%，因而农民的吃粮水平比 22 年前反而下降了。贵州是一个农业省，每年反要靠国家调进大量的粮食。当时，每年全国国民经济总收入为 3300 多亿元，贵州只占几十亿元；全国粮食总产量为 6600 多亿斤，贵州才 120 亿斤。我们贵州长期靠中央调给粮食，每年要调入粮食 10 亿斤，拨款 5 亿元来维持，成了全国的一个包袱。

为什么从 1958 年到 1979 年，我省农业生产发展如此缓慢？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反复深思和认真探讨。我认为，除了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以外，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工作指导上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在变革农村生产关系上，犯了“左”倾错误。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回顾一下建国后前 30 年我省变革农村生产关系的历程。

解放后的前 30 年，我省变革农村生产关系的过程可分为四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 1950 年到 1952 年的土改阶段。旧社会农村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严重地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解放后，党

和政府广大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变革农村生产关系，极大地解放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高度发展。

第二阶段是从 1953 年底到 1955 年夏的‘积极试办 稳步发展’时期。1953 年冬，我省开始试办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 1955 年夏发展到 6599 个初级社，入社农户为 174910 户，占全省总农户的 5.48%，平均每社 27 户。那时合作社的这种规模，比较适合我省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以绝大多数农业合作社增了产。可是，第一个发展时期即合作化的头三年，由于贯彻执行了“积极领导 稳步前进”的正确方针，合作化运动是逐步深入 稳步发展 逐步提高的。二是从 1955 年秋到 1957 年的‘大量发展 猛烈发展’时期。仅 1955 年 7 月至 9 月三个月就发展了 2.4 万多个初级社。到 1956 年 2 月，全省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比例猛增到 89%，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由零发展到占总农户的 47%，高级社的规模全省平均为 370 户，最大的达到 3700 户。到 1956 年 6 月底，全省已有 3469 个农业合作社，入社农户达 300 万户，占总农户的 93.65%，平均每社 87 户，基本实现了初级农业合作化。其中高级社 6179 个，入社农户 168.6 万多户，占总农户的 52.64%，平均每社 273 户；初级社 28518 个，入社农户 131.4 万多户，占总农户的 41%，平均每社 46 户。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全省有 21.86% 的个体农户，直接进入初级社，47.16% 的农户由互助组直接进入高级社。1956 年下半年又加快了初级社并社升级的步伐，到 1957 年上半年，全省有 29180 个农业合作社，入社农户达 319.6 万多户，占总农户的 97.52%。其中高级社 24112 个，入社农户达 296.7 万多户，占总农户的 90.54%，全省基本上实现了高级农业合作化。这个胜利是伟大的，运动的进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因为我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第二个发展时期，发展过快过猛，核算单位过大，所以有的地方脱离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有的地方工作比较粗糙，并且出现平调现象。

第三阶段是 1958 年到 1959 年的人民公社化时期。我省农村人民公社化是 1958 年 8 月下旬到 10 月底的两个多月时间内实现的。在这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全省 2.9 万多个农业合作社并升成为 1719 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达 320 多万户，占总农户数的 97.7% 平均每社 1900 多户。1958 年冬到 1959 年春又进行并社扩社，全省人民公社减少为 528 个，平均每社达 6000 户左右。这时，公社的规模相当于 1957 年高级社的 48 倍。可见，当时我们不但没有注意到农业合作化后期出现的规模过大和平调现象，没有重视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的新矛盾，没有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反而在 1958 年对农村生产关系又实行了一次重大改革，普遍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结果“一平二调”、“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等现象到处出现，使农村生产力受到了更大的破坏。所以，1959 年夏，根据郑州会议精神，进行了初步调整。但是 1959 年秋，庐山会议后，又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以致农村生产关系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调整，而且继续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因而更加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的发展。结果从 1959 年到 1961 年农业生产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粮食减产，造成经济生活严重困难。

第四阶段是 1962 年的调整和“四清”、“文革”期间的反复。1962 年 9 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我省贯彻执行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对农村生产关系进行了调整，把生产队规模缩小到 30 户左右，相当于初级社的规模，把基本核算单位退到生产队，并恢复了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才逐渐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经过三年调整，农村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发展。但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四清”运动的后期，一些地方刮起了“并队风”，生产关系遭到随意改变，生产力又受到破坏。“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有些地方又刮起“并队风”、“穷过渡”风，使农业生产力再次遭到破坏。

（二）前三十年贵州变革农村生产关系的主要教训

通过以上对我省农村生产关系变革过程的历史回顾，我们深感到，其间既有巨大的成就，又有严重的挫折，既有宝贵的经验，又有惨痛的教训。就其教训来说，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片面理解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盲目变革生产关系犯了“左”倾错误。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所谓要“适合”就是生产关系要与现实的生产力性质相一致，即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要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所谓不适合，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当生产力的性质出现了新的变化，与现存生产关系发生了矛盾，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生产关系就与生产力不适合了。另一种情况是，人们凭主观愿望把生产关系推进到生产力的“前面”去了或者“高级”阶段去了，这种不具备条件的变化，这种“超越”生产力性质的生产关系，也是一种不适合。1930年斯大林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中，曾批评过当时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出现的农业公社是条件没有成熟。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我们总是片面强调落后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阻碍和破坏作用，而没有看到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和破坏作用。在这种左的错误观点指导下，盲目变革农村生产关系，一味地往大的规模变，往公的高度拔，结果使我们吃尽了苦头。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从贵州解放后的前30年的历史可以看出，鞋子和脚的关系，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颇有相似之处；鞋要适合脚，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脚要长，但鞋子必须按照脚的大小来做，生产力要发展，但生产关系必须按照生产力的水平来定；大鞋要做好只需一天或数日，可是小脚要长成大脚却需要若干年月，生产关系人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变更了，可是生产力的提高却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以小充大，拔苗助长，好

高务远，急于求成，盲目变革生产关系，企图以此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以致脱离了生产力的实际水平，欲速而不达。这是我省变革农村生产关系的一个严重教训，也是我省农村生产从 1958 年到 1979 年的 20 多年间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 忽视生产力多层次的状况 在方法上采取了“一刀切”的做法，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贵州农业生产力水平很低，生产大都靠牛耕人犁，肩挑背驮；有的地方还在使用原始的、粗笨的生产工具，有的地方甚至还是刀耕火种，赶山吃饭。因此，总的来看，我省农业生产力还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并且呈现出较多的层次。所以，在变革农村生产关系、组织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到生产力多层次的状况，注意到各地区的不同条件，采取不同的形式和步骤。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我们对此是比较注意的。但是，后来却对此忽视了。所以，在全省基本上采取了同一的做法，不管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不管平原与山区，居住集中与分散，汉族与少数民族，不管文化水平、管理水平和思想觉悟程度的高低，不管群众同意不同意，都搞“一刀切”。这就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解放后的前 30 年的实践证明，这种违背客观规律，违背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做法，受到了客观规律的无情惩罚。这是我省变革农村生产关系的又一重要教训。

第三，否认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性，无休止地变革生产关系，既违背了客观规律，也违背了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原理。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比较，生产关系是相对稳定的。一种类型的生产关系形成之后，能在长期基本不变的情况下，起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 卷第 83 页) 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新旧社会形态的变革,但是这个原理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变革,仍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因此,我们在变革生产关系时,既要坚持不断革命论,又要坚持革命发展阶段论。可是,我们过去在变革农村生产关系中,否认了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性,违背了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原理。当我们在农村刚刚建立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高级社,刚刚开始显示出它的优越性的时候,我们就匆匆忙忙地在物质条件还没有成熟之前,把它过渡到包含全民所有制成分在内的人民公社,人为地建立一种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因而挫伤了广大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我省变革农村生产关系的另一重要教训。

(三) 80 年代贵州农村改革的历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 1979 年到 1989 年的最近十年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贵州各级干部和广大农民对农村生产关系进行了重大改革,极大的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就。这是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成功实践,为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开辟了新道路。

贵州十年农村改革的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79 年到 1984 年,是农村第一步改革。重点是建立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农民与集体的矛盾。主要是消除“大呼隆”、“瞎指挥”、“大锅饭”、“二锅饭”等弊端,激发农民的积极性,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8 年贵州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决定,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调查研究,率先改革,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联产计酬的热潮。近 60% 的生产队实行“定产到组”责任制,30% 的生产队实行“五定”“小包工”,10% 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责任制,效果良好。1980 年夏末秋初,省委肯定了包干到户的责

任制形式，指出包干到户是贵州农民的伟大创造，是社会主义农业的一种责任制形式，是发展农村经济的新起点，并发出了放宽农业政策，允许包干到户的通知。从此包干到户责任制就在全省范围内广泛的推行。到 1981 年底，包干包户的生产队达 98.2%，1982 年至 1984 年，又进一步稳定和完善了包干到户责任制。全省 86.9% 的农村实行了林业“三定”，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92.3% 的小型水利设施落实了承包责任制；70% 的乡镇企业建立了经济责任制。

经过第一阶段六年的农村改革，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了包干到户责任制，突破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僵化模式，确定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村微观经济组织结构，农民变成了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加之放宽农村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1980 年至 1984 年的 5 年中，全省农业总产值按 1980 年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 15%，是贵州历史上罕见的高速度。1984 年，粮食生产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油菜、烤烟等经济作物大幅度增长。一批从事商品生产的专业户、重点户和经济联合体开始出现，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二阶段从 1985 年初至 1989 年，是农村第一步改革。重点是改革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制度，扩大市场调节，解决农民与国家的矛盾，以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主要是消除价格背离价值的种种弊端，运用价值规律调动农民的种极性，给农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完善微观经济组织结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搞好宏观经济调控，加速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进程。

经过最近十年的改革，我省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为特征的农业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农